作者在总结抗日战争之后国共内战的不可避免时，以“民国政治的逻辑”作为最根本的线索提出，“民国政治的逻辑”即民国政治的最终评判标准、最终归结是武力的多寡，没有了这个基础，任何的政治设想都无从实现。作者的判断是具有洞察力的，但作者的视野主要聚焦于1944—1946年间，“民国政治的逻辑”此时已经是一个先已存在、被当作既定事实的客观背景，但这个“逻辑”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作者并未着墨于此。问题留给了读者，而显然，这是有关国共内战更深层次的关键。

许多学者在研究近现代史或者相关问题时，习惯于只从中国的历史上去找原因，常常最后便要得到什么“中国的特殊性”“中国文化的落后性”“中国人的劣根性”云云。依此种看法，“民国政治的逻辑”也不难解释了，大概得算是“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的传统逻辑的延续。这样的思维上的惯性是对历史先入为主的曲解，单单仅就“民国政治的逻辑”而言，并不能成立。虽然作者名之曰“民国政治的逻辑”，以“民国”来统摄，应该说，民国初期，这一逻辑尚且还未形成。

辛亥革命成功伊始（仅就推翻清朝而言），民国初创，总统一职被让与袁世凯，其时袁世凯虽为兵马实力最强一方，但远没有单独问鼎全国的实力，若只从武力上考量，断然轮不到袁世凯得此大位，这个阶段主导着革命党人的是对革命真诚而又不成熟的理想主义。即使到了北洋政府，军阀混战的时期，政治上的斡旋与民众思潮的作用，仍不可小觑，“五四”运动即是一例。确切的说，作者所言的“民国政治逻辑”的确立，最根本的原因不能从中国的传统来寻找，而是苏联的影响。

孙中山为改革国民党。学习苏联列宁建立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将国民党在形式上改造为了列宁式的政党组织。政治上的极端排他性与以党治军、以党代政、以党治国是列宁式政党的突出特点，虽然国民党在民国的独裁于法理上是以“总理遗教”中的“训政”为依据的，由于并无“训政”的任何先例，孙中山已于北伐前夕与世长辞，蒋中正也不是孙中山那样思想深邃、眼界高远的政治家，“训政”的实际，仍是带有不完全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威权统治（而不是极权）。但毕竟国民党的理念中清楚的说明了“训政”阶段的过渡性，最后也的确在蒋经国时代算是走上入“宪政”，不过那就是国民政府败退到台湾一隅之后的事情了。

而中国的另一个比国民党更为彻底的列宁式政党，几乎是完全的翻版，中国共产党，更加不可能超脱所谓的“民国政治的逻辑”了。从这个角度上说，那么以“联合政府和一党训政”作为这一时期（1944—1946年）中国政治的主题，或至少是本质的冲突来说，并不能算是十分妥帖。与其说中共是从中国整体的利益为直接出发点提出“联合政府”口号的，不如说这是出于中共领导层尤其是毛泽东在政治手段上的高超的灵活性，是一种随时以具体情况为转移的为争取自身最大政治利益的“革命机会主义”。蒋介石的国民党固然一开始便无意予共产党以政府中的平等地位，共产党在军队等问题上也并未表现出与“联合政府”的要求相一致的举动，双方的态度成了正反馈，仅凭现有的史料甚难做出判断，究竟是否有哪一方，是在真心实意地谋求国家的和平。双方在论战中都以“自由”“民主”作为宣传的旗帜和指摘对方的依据，最后尘埃落定之时，不论是“自由”还是“民主”。都再也不见了踪影。

在二十世纪初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传统”与“现代”激烈碰撞的时刻，“后进”国家的道路上总是荆棘密布，这或许是最大的悲剧所在。